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XUESHUSHI YU DANGDAISHIXUE DE SIKAO

学术史与当代史学的思考

陈其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



学术史与当代史学的思考

陈其泰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学术史与当代史学的思考 / 陈其泰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9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ISBN 978-7-303-12166-3

I. ①学… II. ①陈…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②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文集 IV. ①B2-53 ②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8709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4.75

字数: 385 千字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策划编辑: 刘东明

责任编辑: 刘东明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瞿林东 陈其泰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卫东 王开玺 王冠英 宁 欣 汝企和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郑 林
侯树栋 耿向东 梅雪芹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近年来，北师大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特别是崭露头角的部分中青年学者的作品，已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了集中展示北师大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也为了给中青年学者的后续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特别是以中青年学者作品为主的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3月

卷首识语

这本论文集按文章的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篇为“学术史探索”。有关清代和近代学术史的研究，是我这些年来关注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寻其源头，则始于我念硕士研究生之时。1978年，我有幸当了白寿彝先生的学生。入学不久，先生即与我商定了以《论魏源的爱国主义史学著作》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了对魏源所处的时代和嘉道年间的学术环境获得认识，我先用半年时间认真研读了“文词俶诡连犴”、骤读之下难以索解的《龚自珍全集》，且上溯选读了一些清初及清中叶学者的论著，以后又因教学工作和所承担的科研项目的带动，经常阅读晚清和近代学者的著作。多少年来，我徜徉于其间，时时感到对这三百余年的学术史怀有特别的研究兴味。所得的成果，除见于早先出版的《清代公羊学》、《中国史学史》第6卷《中国近代史学》等书外，此次编辑这本论文集，有机会将相关文章作为一个专题选入。我将《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以下7篇文章编为一辑，目的即为了集中起来向读者请教。我深深感到，自乾隆末年以后，不仅社会状态孕育着巨大变化，学术风尚也开始了意义极其深刻的变化。由此发端的此后百余年，开启了中国学术史上相继要求思想解放、学术观念逐步更新、研究范围不断突破传统模式的新局面。这些风尚并且有力地推动时代风气的变迁，从而最终汇成浩浩荡荡的新思想潮流。此百余年的学术变迁史，确实值得我们作大力开拓和深入发掘，而对其中一些开启了学术新风气的出色人物的学说，更值得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作重新审视和评价。

譬如，对乾嘉时期著名学者章学诚的学术建树，前辈和时贤已发表不少论著，使人得益良多。不过，以往只关注从史学评论视角对《文史通义》进行评价实有明显的不足，因为章学诚著述的重要立意所在是进行哲学问题的探索。他自标界说，表明要在训诂考证学风盛行的情况下，独树一帜，以“义理”即哲学思想为指导，探究学术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其历

史哲学探索的第一层次，是对儒家经典《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等作新的诠释；第二层次，是围绕哲学最高范畴“道”，提出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圣人学于众人”，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道也应向前发展等一系列新的命题。前者是其“义理”探讨的基础，后者则是深化和升华。章学诚自信其哲学探讨之作有“开凿鸿蒙”之功，近代学者梁启超高度评价章氏学术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的源泉”，这些都说明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的发掘、阐释，实为亟须补上的重要课题。有关 19 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认识，实则也很有必要以新的视角贯通起来考察。进入 19 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龚自珍、魏源预见到“乱将不远”，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其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构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观；至 19 世纪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结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传播了西方近代进化论，因而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再如黄遵宪，他是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和杰出的爱国诗人，又著有及时记载日本明治维新历史巨变的《日本国志》，寓涵他探求救国道路的深刻用意，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是维新派骨干人物之一。黄遵宪对世界潮流有极深刻的观察，并形成了堪称代表了时代智慧的中西文化观。1902 年，黄遵宪针对梁启超的保守倾向态度，鲜明地提出“大开门户，容纳新学”，要求通过大力输入西方新学理，从比较中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道理，经过与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精华相结合，为救亡图强寻找正确出路，其文化思想达到了时代的高度。这是因为他处在中西文化撞击的环境中，本人遍历四大洲而锤炼的文化品格所决定，对于旧学他持极其可贵的批判态度，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关于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同样提供了研究问题应当摆脱以往窠臼，实事求是地分析原著而获得新见的极好例证。梁启超虽然有“流质易变”的弱点，但他在近代史上实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他是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人物，在 20 世纪初年又是大力宣传新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他晚年所著《欧游心影录》一书，以往论者多据以批评梁启超的文化保守思想，这种贬责实有以偏概全的缺陷。梁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游欧，固

然看到大战的灾难确实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危机，但是，他更通过对欧洲社会的亲身考察，深刻认识到欧洲下层民众的自主自觉和“个性发展”，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源泉。故其结论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一方面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大力学习西方的进步文化。此书的思想价值所在，即表明梁氏晚年对中西文化问题达到自觉的认识。关于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演进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在发掘大量新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考察，也能得出一系列具有创新价值的认识。由鸦片战争时期发轫的近代史学，其80年行程中，在历史观、著述内容和体例形式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重要的原因即因西学的传播而推动形成的，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学术史的重要课题。本书《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一文论述由于逐步吸收西方新学理，近代史学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各具鲜明的时代特点。鸦片战争前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中，以魏源为代表的有识史家呼吁了解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撰成介绍外国史地的名著，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旧格局。1860年至甲午战争前，先由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人物，从以前的“师其技”跨入到“采其学”；其后，以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为代表，直接介绍外国制度文化，探讨其富强之由，为变法运动提供了借鉴。戊戌前后至20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进化论在国内迅速传播，成为国人观察历史和民族前途的指导思想，由此结出《新史学》、《中国古代史》等硕果，因而宣告了严格意义的“近代史学”的诞生。

中篇为“当代史学的思考”。选入的文章旨在讨论如何正确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自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史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三四十年代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关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基本估价，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历史研究虽然走过了曲折道路，但是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十七年”的史学完全服务于政治，它被

“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体系”所笼罩，故无学术独立性可言，甚至将“十七年”史学与“文化大革命”10年中“四人帮”疯狂践踏、摧残历史科学、蓄意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扯到一起，认为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史学应划作一个历史阶段。如果后一种观点确有道理，那么，“十七年”中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也就早已过时或应宣布为非科学的，当前史学应当彻底地改弦更张的看法，似乎也就有道理了。可见，对“十七年”史学的方向如何正确评价，实则是直接关系到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和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在新世纪史学中的作用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既经历过严重曲折，有过严重失误，同时又确确实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进入新时期之际，我们为了拨乱反正、揭露极左错误的危害，曾经着重批判教条化、公式化的种种恶劣表现和严重危害，反思其教训。如果说，在当时条件下着重批判错误一面确有必要的話，那么在今天，认真地总结“十七年”中历史研究的成績也同样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今天的许多历史系大学生和研究生，因为没有经历过“十七年”，又少能看到正确评价“十七年”史学的文章，所以竟然以为“十七年”史学没有什么成绩可言，闭目一想，“十七年”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教条化盛行”。这不仅造成对“十七年”史学的完全错误的认识，而且导致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今日的发展前景认识模糊。今天，站在新世纪之初的时代高度，回顾新中国成立后10余年历史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正确的学风，坚持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将之应用到研究中国历史实际中，推进史学工作的发展，开展健康的批评和讨论。一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只会套用现成公式，不愿作严肃、艰苦的搜集、分析史料工作。“十七年”历史研究的成績，即是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正确方向下所取得的，也是在与背离唯物史观原理的教条化倾向作斗争中取得的。曲折和失误，则是背离了唯物史观的结果。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是总结“十七年”史学道路的一个实质性

问题。“十七年”史学不仅在通史、专史、史学理论、整理历史文献等方面有巨大成绩，同时，由于学习唯物史观，一批原先在三四十年代主要从事实证性研究的学者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水平，从而使他们的学术达到新的境界；“十七年”使我国历史学领域基本上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大学历史系教育课程设置比较齐全，并且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后来成为在新时期中活跃的学术骨干，为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开创新局面作出了许多贡献。所以，“十七年”史学把 20 世纪中国史学推向新的阶段，由此而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和生命力。

近年来，唯物史观受到严重的责难和挑战。原因很复杂，需要经过深入讨论和不断实践，来予以澄清和作出理论上较为令人信服的回答。我想，其中有两点可能是比较重要的：第一，要认真区分以往历史研究成果与失误之轻重大小，尤其是要深入分析造成失误的原因，不能一讲到以往的失误，就归结到唯物史观的账上。第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总结了人类历史和社会结构等，创立了唯物史观的学说，总结出人类社会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项，而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规律”，不应理解为就如同自然科学的“定律”一样，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都要重复地出现的东西。毋宁说，是以它概括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指导我们以其原理从生动丰富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发掘和总结。新世纪的史学，必定前景更加广阔，风格更加多样，方法更有不断创新。然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体系，它能在吸收许多有益的学说、原理之中丰富自己，在实践中发展自己。新世纪中最有前途的史学，能真正拿出来与外国同行平等对话的史学，必定是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又善于发扬前人学术遗产，并通过对外交流、学习外国有用东西以丰富自己，在此基础上勇于开拓创新的史学流派和著作。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取了若干应予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一文认为自“五四”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应划分为三个阶段，并特别提出：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但成绩仍是主要的，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言“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主要表现在：以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得到坚持，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以及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等方向都有重要成果；当 1958 年以后教条化严重泛滥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勇于挺身而出进行抵制，在他们身上真正代表了唯物史观的风格；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术达到新的境界。《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一文，即以蒙文通、谭其骧、唐长孺、赵光贤为代表，论述这些原先在严密考证上训练有素、重视因果关系等治史观念的学者，在接受唯物史观指导之后，自觉地探求历史的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遂将新历史考证学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因而分别在通论性研究、民族史研究、历史地理学、断代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此证明：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它与新历史考证学的方法互相贯通，而又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更深刻的洞察力。精熟典籍、考证严密的学者掌握了它，思想认识能力就能大大得到提升，在学术研究上跃进到新的阶段。这是 20 世纪中国史学演进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高度珍视并予以大力发扬。《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一文，论述关于近代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收获。这一探讨历经曲折的过程，其发端于 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论证了近代史主线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正确观点；50 年代对近代史分期进行了热烈的争鸣，认识更加深入，尤其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同时应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考察近代社会进程的看法，具有前瞻性意义；进入新时期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指引下，学者们从新颖的视角进行思考和分析，更有许多新的创获，胡绳、李时岳、陈旭麓、刘大年的主张尤有代表性，集广大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得出“两个基本问题”的科学认识。总结这一探索历程有深刻的意义，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坚持革命性与科学性二者相结合，坚持从掌握充分的史料来科学地分析问题，这同死搬教条的做法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理论问题最终圆满解决，是近代史领域坚持解放思想，坚持以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逻辑依归。《范文澜与毛泽东：学术的关联和风格的共鸣》一文，论述范文澜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把近代史研究作为治学之一个重点，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治史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的

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一贯自觉地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积极地倡导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等项治学旨趣和特色，都是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个人影响。他们两人各自在学术领域和政治领域，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又同样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的特色，因而彼此在精神上保持着强烈的共鸣。

下篇为“白寿彝学术风采”。选入的文章是有关白寿彝先生学术思想的评论和对他高尚人格的缅怀。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学术园地上辛勤耕耘长达半个多世纪。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1980年又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曾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他治学领域广阔，在中国通史、史学理论、史学史、民族史、宗教史、中国交通史等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共计12卷22册，共约1400万字，是以科学历史观为指导、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容丰富系统的通史巨著，汇集了全国约500位专家的劳动，凝聚着总主编白寿彝先生20余年的心血。学术界称誉这部巨著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在此后5年时间内，《中国通史》又重印了3次，累计印数达37000套，这在大型历史著作出版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由白寿彝先生主编、撰成于1980年的《中国通史纲要》则先后重印达30次之多，总印数逾100万册。寿彝先生撰著和主编有《中国回回民族史》（四卷本）、《回族人物传》、《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史学概论》、《白寿彝史学论集》、《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中国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论集》等著作，无不是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迪。严谨治学和锐意创新，是贯彻寿彝先生一生治学的准则，是他能在多学科领域内同时取得卓著建树的真谛，也是他老人家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撰写论著，总是广搜材料，仔细地审查和分析，深入开掘，多方面发现材料的内在联系，总结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中的规律性，然后熔炼成观点鲜明、表达准确、逻辑清晰、篇章结构合理完美的文章。他临文必敬，大到数十万字的专著，小到一千几百字的小文

章，他无不精心构撰而成，真正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对访问他的记者说：我永不走老路。并告诫周围的同志和学生：你只有把生命投进去，你写的东西才有生命。他又常说，我 70 岁以后才真正做学问。当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寿彝先生已届 70 岁，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是迎来他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和重大科研项目，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后 20 年中完成的，确实令人景仰和赞叹！他对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真挚地热爱，大力继承、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遗产。同时，他坚信社会主义前途，坚信以与时前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翔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的优良学风和创新精神无疑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高度珍视、发扬光大。

这一辑文章，包括对寿彝先生撰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通史·导论》卷等著作的书评，有关《中国通史纲要》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处理的评论。《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一文，对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的重大成就作了简略的评论，认为：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内容丰富的皇皇巨著。它集中了“积一代之智慧”的研究成果，在历史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在体裁上创造了新综合体的崭新形式，实现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这部巨著的完成，是白先生和各位共同合作的专家们向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 21 世纪献出的一份厚礼！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不顾高龄，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学术创新精神，以一二十年的艰苦劳动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对于我们后学实是最可宝贵的激励！这部巨著又昭示我们：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向，发扬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吸收近代史家的优秀成果，坚持学术研究中的创新精神，就能不断推进史学走向新的境界。这对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白寿彝先生编纂〈回民起义〉的学术价值》一文，则对寿彝先生于 1952 年编纂完成的《回

民起义》(4册,共200余万字)一书作了简要评价,认为:这部史料汇集的编纂确是开创性的工作。搜集回民起义史料的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因为,在清代,云南或西北的起义都被镇压,也就不可能有当时人站在起义民众立场所作的正面记载,若干原始资料即使能幸而得以保存也早已散落在民间,寻找极其不易。白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时,即以执著的精神千方百计到处访求,包括在昆明和外县,克服种种困难,他辗转寻觅,找到了一些原始史料和抄本,其中还有马生凤这样的长时期以保存本民族历史文献为职责的回族学者搜集并存留下来的资料。《回民起义》书中有关清代云南回族人民起义的史料,即以此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又进一步在北京各图书馆、回族学者和宗教人士,以及其他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帮助下,加以扩充和系统化。这部书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首先在于搜集文献丰富,种类齐全。共包括四大类:(一)官书(和半官书);(二)奏议;(三)私人著述;(四)方志和碑刻文字。正因为《回民起义》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出版以后一直受到近代史和民族史研究者的重视。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中国书店又将此书联合再版发行。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策划与大力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刘东明同志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从事本书编校工作,在此谨致谢意。本书选入的文章大多先行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各位编辑同志均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博士生刘永祥同志为本书选入文章的搜集、多篇文稿的录入、查对引文、校正错讹,以及规范、补充全书注释等项,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对工作十分认真负责。多位博士及在读博士生田园、赵海旺、张峰三位同志也都为作者提供了热心的帮助。谨此向各位尊敬的朋友和热心的同学致以衷心的感谢!

书中收入的文章均经作者对文字作了校订,有的篇目对内容略作补充或删改。本书存在的错误、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写于2010年10月

目 录

卷首识语	1
------------	---

上 篇 学术史探索

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	3
一、哲学探索：《文史通义》重要立意所在	3
二、历史哲学探索的第一层次：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	6
三、历史哲学探索的第二层次：论证具有深刻意义的新命题	12
四、“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窠”：将“道”的探究推向新境界	21
19 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27
一、时代剧变与龚自珍、魏源提出的历史演进的新命题	27
二、康有为糅合西方政治学说的新“三世说”	36
三、严复《天演论》历史演进观的时代意义	44
黄遵宪文化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49
时代剧变推动下近代史学演进大势	58

一、民族危机的紧迫感与救亡图强史学的勃兴	58
二、维新变法酝酿发动与近代历史变易观和进化论的传播	66
三、封建帝制崩溃前后“新史学”的倡导和推进	72
晚清公羊学的发展轨迹	86
一、戊戌前后的公羊学说	86
二、从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考察	88
三、公羊朴素进化观与近代进化论的传播	91
四、爱国志士共同的思想历程	94
五、公羊学说与“新史学”思潮	97
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自觉：《欧游心影录》的思想价值	103
一、梁氏游欧的目的	103
二、社会成员的自主自觉精神，是欧洲进步的不竭源泉	105
三、对中国文明前途的深刻思考	107
西学传播与近代史学的演进	110
一、鸦片战争时期中西文化接触与史学风气的变化	110
二、从冯桂芬《采西学议》到黄遵宪《日本国志》及时记述 日本“改从西法”	114
三、戊戌前后以输入西学为急务与对“君史”的批评	117
四、严复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系统传播的巨大功绩	122
五、以新鲜的历史观为指导与“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	127

中 篇 当代史学的思考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理论的重大贡献	133
一、唯物史观理论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	134
二、在廓清谬误中大大推进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	137
三、永远保持唯物史观常青的活力	143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147

一、唯物史观传播把中国史学推向新阶段	147
二、如何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史学道路	156
三、新时期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及面临的问题	168
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	172
一、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如何提升为近代的学问	172
二、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	178
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宏观概括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 崇高责任感	184
四、诸多领域所取得的风格多样的出色成就	194
五、新历史考证学演进道路的启示意义	20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学术价值	212
一、规模宏大，网罗齐备	213
二、贯彻中国史与世界史密切联系的指导思想	219
三、提供研究性成果，为初涉史者指示门径	225
四、以科学方法整理历史文献的典范工程	232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理论	237
一、20 世纪 50 年代近代史分期讨论中的理论思考	237
二、新时期关于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新认识	251
三、坚持正确认识路线的逻辑依归	259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262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论题的价值	267
范文澜与毛泽东：学术的关联和风格的共鸣	278
一、研治中国历史的学术取向之形成	278
二、确立以“实事求是”为治史的指导思想，对教条主义 深恶痛绝	281
三、积极地提倡和模范地实行百家争鸣	285
四、基于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而产生的强烈共鸣	287